

孙中山与德国

王维江

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

汉语文献均未提及孙中山与德国的关系，笔者在搜集整理近代以来德语文献时发现德国新闻记者 Erich von Salzmänn 于 1912 年 10 月 4 日在上海采访孙中山的全文，该文从未进入到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者的视野，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与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年谱》（征求意见稿，北京：中华书局 1976 年）、魏宏运著《孙中山年谱》（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79 年）、陈锡祺著《孙中山年谱长编》（中华书局 1991 年）诸书都未收录。

作者 Erich von Salzmänn，生卒年及生平事迹皆不详。曾在中国为在华德文报纸撰稿，著述丰富：如《在马鞍上穿越中亚》(Im Satteldurch Zentralasien, Berlin: Reimer, 1903); 《与 Herero 族作战》(Im Kampf gegen die Herero, Berlin: Reimer, 1905); 《来自年轻中国：革命之后的旅途见闻》(Aus Jung-China: Reise-Skizzen nach der Revolution, Tientsin: Tagebla. fuer Nord-China, 1912); 《革命的中国》(Das revolutionaere China, Berlin: Reimer, 1913); 《玉凤凰：二十世纪初的一部中国革命小说》(Yue Fong: der Nephrit Phoenix, ein chinesisches Revolutionsrama aus dem Beginn des 20. Jahrhunderts, Berlin: Dt. Verl.-Anst., 1926); 《中国胜了：对革命的中央帝国的看法和旅途印象》(China siegt: Gedanken und Reiseeindruecke ueber das revolutionaere Reich der Mitte, Hamburg: Hanseat. Verl.-Anst., 1929)。

作者有三部著作都聚焦于中国二十世纪的革命。在孙中山结束北方之行，从青岛返回上海的第二天，Erich von Salzmänn 就采访了孙中山。孙中山坦率谈了自己对中英、中俄、中日和中德关系的看法，还谈到中国的军队改革和铁路建设计划，尤其是他对中日必有一战的展望和对中德关系的重视，为我们理解后孙中山时代的民国政府的外交政策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采访孙逸仙博士

记者：Erich von Salzmann

上海，1912年10月4日

一到上海，我就立即去寻找同盟会的领袖们，他们的总部办公室设在南京路上。在那里，他们极为热情地接待了我，并很快满足了我采访孙逸仙博士的愿望，孙博士刚从北方经青岛返回。10月3日，孙博士从各方面来看都甚为成功的北京之旅回到了上海总部，当天下午，总部办公室就通知我，次日上午孙博士将接待我。10月4日上午，我驱车前往，孙的住所坐落于法租界。这是一栋红砖墙的别墅，其周围环绕着一个尚未完工的花园。我一到就被引入他的书房，他热情地问候，与我握手。孙的人格里有一种很吸引人的东西，他很容易动感情，由此他那友善的面容令人难以忘怀。但通常他的样子十分温和，让人很难想象他曾有过非同寻常的动荡经历。我首先问他对青岛的印象，他就说了下面的一段话，尽管我本人对此并不赞同，但它出自孙之口，极有意义，我就尽量如实陈述：

“青岛太让我喜欢了，它是未来中国的榜样城市，假如我们的500个县城，每个县能有10人前来青岛，研究它的管理，研究它的城市街道和乡村道路、研究它雄伟的船厂、海港，研究它的高校、城市及政府设施，这就会给中国带来无尽的好处。青岛的总督 Meyer-Waldeck 十分友好地接待了我，他是一位非常明智而友善的人，在这样一个显然不是很轻松的岗位上，他无疑是称职的官员。我没有见到 Heinrich 王子，因为我在那里逗留的时间太短，他正好出城去视察部队了。”

在这次采访之前，我已经与很多有影响力的中国人进行过交谈——包括新闻界的同行，所以我就请教孙对青岛于99年租约期满之前回归中国的看法，孙回答道：

“在中国这一崭新的国家正在建立的时刻，若德国给予我们这样的前景，即未来会归还这一榜样城市，这将对对中国表示友好的最有力的证明。不管是以现金的形式，或者以贷款的形式，中国将补偿德国归还青岛的费用。中国会把德国列于首要的位置，这将会给德国的工商业带来丰硕的果实，即将要建设发展的中国需要技术和原料，德国肯定会被优先考虑，首先我本人保证，将把学生和官员源源不断地输送到青岛，学习各方面的经验；同时我也希望，大量的德国官员来到中国，通过互相学习来促进彼此的良好关系。现在我们已经把德国当作中国无私的朋友。我在想，没有必要立即就完全彻底地归还（青岛），在10年、15年、甚至20年以后再办也不迟。就我在世界各地的观察，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德国都是我们现成的老师。德国与英国、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把任何事情都做成了系统，并且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特别认真敬业。

英国则是各人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可以举几个行业来说明，比如报刊业、比如法律界，比如香港和新加坡的城市建设，德国明显要先进得多，德国把一切都纳入科学制度，而这正是我们眼下突破传统所需要的。

当然有很多巨大的困难需要克服。我们很愿意将整个国家不加保留地向外国开放，但是现在外国人还享有治外法权，相对于我们自己的国民，他们具有优先权利，而有些外国人还在为一己的目的利用这种特权。因此目前我自己都不太清楚，该如何面对这一问题。但是德国给予我们这样的印象，它至少采取的是中立的立场，不会利用我们眼下的虚弱，像其他国家那样毫无顾忌地趁机获利。”

我接着请教他对中国政治目前形势的看法，是否因巴尔干战争而对日本的威胁感到担忧，日本算准欧洲列强无暇顾及亚洲。孙对我说：

“我不认为英国和俄罗斯会吞并西藏、蒙古和北满洲，他们只会坚持索取某些特权，这是我们目前还无法拒绝的。

关于日本，当然还无法看出它会对我们怎么做，假如欧洲陷入战事，列强在亚洲的控制力将会减弱。尽管如此，我还是不相信，日本会卑鄙（他用了很长时间才找到这个合适的词语）到如此程度，吞并满洲。我也不认为福建省处于非常危急之中。我知道，现在日本人可以在 48 小时之内轻取北京、在 10 天之内占领整个直隶；我知道，他们已经做好准备，等待着突发事件的到来，不仅夺走我们的满洲，而且还压榨我们付出高额的战争赔款，这样我们将长期陷于无法发展的境地。我们要竭力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正因为每个进犯者都以为，占领了现在的首都，就拥有了整个中国，所以我赞成迁都，不是迁往军事战略上不易防守的、对健康不利的南京，也不是迁往武昌，而是类似于开封府或西安府这样的地方。但是此事很难实行，因为费用太大。假如今天日本进攻我们的话，我们将会应战，尽管我们没有日本那样的军队。我们的士兵和我们的同胞在革命中已经展示出自己的意愿，他们会为祖国付出生命。如果开战，我会尽一切努力组织起民族抵抗。与日本的战争将不会是几周，而是几个月，甚至好些年。占领几个北方大城市并不能使战争结束，我相信日本人对此也很清楚，他们也怕很穷的国家要负担起的高昂的战争费用。日本如今负担不起一场至少持续五年的战争。”

我又问起军队改革之事。孙回答：“我知道，日本军队的辉煌和他们所取得的战争成就要归功于德国式的基础，为此我也希望，我们的军队也能建立在这种德式基础之上，其实现在国内的军事装备大多已是来自德国。一个强大的军队对于中国是极其重要的，我希望德国能在这一领域给予我们帮助，特别是给我们提供军事教官。德国人是否明白，一个强大的中国，对德国意味着减轻东部边界的负担，因为这不仅会牵制俄国的军力，而且能平衡全球局势？”

我表示同意，并提到几个人的名字，都是德国军队改革的有名人物。孙博士立即记

下了名字，他对我说，他到德国将亲自与他们联系。然后我又问起借款、他的铁路规划和不久前公布的庞大的纲要。对此他说：

“我这里有好消息，在北京，马上就要与六国谈判小组达成协议了。

在铁路方面，我首先要修建的是经过富裕地区的能盈利的线路。开往西藏、新疆和蒙古的长途线路将放在第二位。这里手头的工作结束之后，我准备前往欧洲旅行，届时我自己与大的铁路公司联系，从专家那里获得发展可能性方面的数据，然后再做决策。”

最后孙对我说：

“我的欧洲之行的主要目的地就是德国，详细了解德国的基础设施、管理和工业情况。我把德国看作一切的榜样，如果贵报能为我的这一目的提供方便、铺平道路，我将不胜感激。”

在我们谈话期间，已有几十张名片递了进来，每天来拜访这位大忙人的人潮汹涌。他会很快来德国，我们有理由为他的努力提供各方面的帮助。毫无疑问，孙博士被欧洲诸国、特别是被北方低估了。我们从报纸上所获得的他的信息，是被扭曲了的形象，只是他温和个性的一方面。孙属于现代中国的、有自控力的人，他的名字在南方具有魔幻般的力量。今天为德国更多地争取孙博士，就如同取得了一场大战役的胜利。

（译自 Erich von Salzman, *Aus Jung-China, ReiseSkizzennach der Revolution, Tientsin: Tageblattfür Nord-China, A.-G., pp. 142-146.*）

